

一个人 与一座城市

来到 麦保曾家,他正在接电话。南京市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邀请他到和平影城观看《建国大业》首映。

“和平影城就是和平电影院吧?好,我当然要去的。《建国大业》我知道啊,在电视上早就看到介绍了。别说这个电影了,马上国庆节阅兵式有哪些新式武器亮相,我都知道。”挂了电话,麦老哈哈一笑,带着几分小得意,“他说我超越时空,跑到前头去了。”

搞了一辈子规划工作,92岁的麦保曾描绘出一张张城市的未来面貌,又在接下来的日子,亲眼见证着它们变为现实。

□快报记者 孙兰兰

命大
茅以升救了他

麦老一口京腔京韵的普通话,声音洪亮中气十足。可一打听,竟然是广东顺德人。

他又得意了,“我广东话讲得也很好啊,几十年前,到香港去开金陵饭店的建设论证会,我直接用广东话和他们讲;后来,国家组织全国的规划专家团到美国,在明尼苏达州,我用英语演讲20多分钟,谈古城保护。结束后美国人问,你这是正宗的华盛顿口音嘛。”

1917年,麦保曾出生在广东。上小学的时候,跟着父母来到北京。1941年,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唐山交大。这所学校当年工科全国第一,与清华齐名。出过茅以升、钱伟长、陆定一、严恺等多位著名学者。学校推行的是美国式通才教育,除了国文,其它科目很多都是外国老师直接用英语讲课。

战乱年代,麦保曾经历了数次危险事件,每一次都差点丢了性命。

毕业后,麦保曾到贵阳工作,修建电厂、为黔贵铁路选址。一次,他独自在山里勘测地形,对面山坡上几只猿猴跳来跳去,他就用石子去丢猴子,聪明的猴子也报之以石。就这样,他与猴子隔着江,用石子掷来掷去,玩得不亦乐乎。一个不小心滚下山坡,掉进急流。幸亏他泳技很高,拼命游才爬了上来,免于死。

“人家都说我是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挺有道理的。”麦老轻松地述说着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,乐呵呵的。

痛心
没保住通济门

抗战胜利后,麦保曾来到南京工作,在工务局当工程师。当时的南京城内城外满目疮痍,多数街巷是狭窄的断头路。

1949年4月23日,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,开进南京城。麦保曾正在街上修马路,眼见着这支队伍由西向东,开进了总统府,不久就把门口国民党的旗子降了下来,升起了红旗。

解放后,麦保曾在建设局工作。新时代,城市在飞快地发展。

城墙运动中。“不但规模是老大,而且通济门的瓮城平面是曲线形,柔和美丽,价值超过了中华门。”麦保曾将详细情况写成报告,呼吁千万不能再拆了,应当加紧保护。“要不是朱口再三呼吁,连中华门瓮城也给拆了。”麦保曾痛心不已。

下放
提前“参加”南水北调

城市的灾难,在一波接一波更猛烈的“运动”中,渐渐蔓延成家庭的灾难。

陆涛是麦保曾的爱妻,在东南大学教土木工程,1969年文革时被揪斗,最后在学校废旧的厕所里悬梁自尽了,死后几天才找到尸体。

“她想不开,弄不清楚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。”麦老叹息,如果爱妻活下来,想必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。从此,他过着单身生活,再未结婚。

妻子去世的11个月之后,麦老带着儿女,被下放到苏北淮安农村。日子过得极为艰苦,人人都以为一连串打击,会让他垮掉,乐观的天性支撑了他。

“别人下放到那儿是当农民,当地人真好,一看,我们爷仨什么农活也不会干,就让我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什么的。”一家三口成了文艺骨干,儿子演李玉和,女儿演李铁梅,麦保曾拉起二胡,一出《红灯记》唱得有声有色。女儿还在当地学会了针灸,邻居家的老大娘牙疼,扎了几针竟然好了,“麦医生”的名头很快传开了。

让麦保曾没想到的是,没过多久,竟然又可以接触他所热爱的规划设计工作。为了解决苏北农田灌溉问题,淮安需要修建一个翻水站,4.5米直径的巨型水柱,要从下游翻上来。

当地哪有人懂这些,江苏省水利厅想到了麦保曾。没有人帮忙,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全程监督,只有他一个人。孩子上学住校,他就住在工棚里,一住四年。冬天零下几度,冻得伸不出手,他在四处透风的工棚里画出一张张图纸。

文革时的很多工程,由于缺乏科学严谨,质量不过关,而这座翻水站结实健康。前几天,麦老往翻水站打电话,老工作人员还记得他,“他们告诉我,站里的机器设备早都换新的了,不过土木工程还是以前的。”

现在,这座翻水站已经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上的一个组成部分,发挥着更大作用。

规划
为南京设计未来

麦老给南京留下的东西,就



麦保曾:他描绘并见证了南京的成长

更多了。这个城市在解放后建起的每一座标志性建筑,背后几乎都有他的智慧闪烁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建南京长江大桥,铁道部门是主力,南京当地的建设部门其实只是配合。麦老同样认真。

南京长江大桥的部分数据,直接参照苏联专家指导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。在迷信苏联的年代,这根本就毋庸置疑。麦老到武汉考察,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大桥,发现在引桥上就很吃力,有些老旧的汽车开到那儿,还容易熄火。于是他建议,南京应当降低引桥的坡度,这点后来被采纳了,所以,南京的大桥“爬”起来轻松多了。

还有一个细节,南京长江大桥的人行道特别高。这也是麦老的建议。他在武汉目睹了一起大桥上的车祸,车子冲破桥栏杆,掉下江。当时他想,如果人行道高一些,即使有车子失控,冲向旁边时也有台阶可以挡一挡,起到缓冲作用。于是,人行道被“拔”高了一大截。

1979年开始建设金陵饭店,麦老赴香港参加设计方案评审。37层,100多米高,在为“中国第一高”震撼之余,他发现,六部电梯与客房数量的比例不太对,根据运力,每层完全可以再加一些房间。于是,有了现在金陵饭店的客房格局。

当然,麦老最出名的“作品”,还是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南京城市总体规划。这是南京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、并且由国家批准正式执行的规划文件。这部简称“83版”的规划,至今仍为许多规划行业人士津津乐道。

“1978年,我们二三十个人,借用市府大院第15号楼,花了一年半的时间,才有了这部规划。”时任规划局总工程师的麦保曾,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做调研,六合、大厂、栖霞、东山、铁心桥……跑遍了整个南京城。

规划一出来,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“当时很有成就感。你想,之前城市想怎么搞就怎么搞,哪有什么规划。现

在我们做出来规划,告诉大家,以后南京会变成什么样,大家觉得看到了一个科学的未来和希望。”麦老遗憾地咂咂嘴,3年后突然发现,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计,光是城市人口就已经突破了规划中的数字,“后来我们自己反省,还是眼光短浅,看得不够长远啊。”

当下
92岁还是顽童

从上世纪90年代起,麦老退休赋闲在家,不过,他可丝毫没闲着。

儿子女儿都在美国,连外孙女在美国都已经当上了主治医生,他却宁愿一个人留在南京生活。“他们有他们的事业,我也有我要做的事情。”作为全国著名的资深规划专家,麦保曾被业界后辈尊为“国宝”,每一版的南京城市规划,以及重要项目建设规划,评审专家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他。

国庆六十周年快到了,麦老更是特别忙,要参加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和会议:规划的、城建的、政协的、农工民主党的,还有杂志约稿、书画展家要墨宝参展……他一项项安排得妥妥当当,有条不紊。

没有这些活动,他独自呆在家里也忙。每天早晨七点起床,晚上九点半睡觉,中午小休一会。一天三顿饭时开饭,米饭吃一小碗,生活很有规律。自由安排的“节目”可就丰富了。每天读两三份中文报纸,还要读一份英文报 China Daily(中国日报);听听古典音乐,看看电视,写写书法,玩玩电脑。

90多岁的他,可是个电脑使用高手。写文章全是自己打字,还有MSN账号,用来和在美国的孩子聊天、视频。“连连看”这些游戏,他早玩腻了,不过瘾。现在,他最迷恋的是用鼠标在电脑上画油画。

“好玩的事多着呢。”麦老“玩”心很重,总爱找些新鲜的事来做。他总结自己有“三乐”法宝,知足常乐、助人为乐、自得其乐。果然,他这传奇的一生,玩得很快活。



2006年金陵城俯瞰 快报记者 路军摄

1938年,交大往贵州平越迁校。他自己搭上一部黄鱼车,赶往贵阳与同学会合。弯曲狭窄的道路非常险要,车行到山坡上时,全车人正在打瞌睡,只有麦保曾一人没睡。突然间,他感觉到车在往后退,来不及多想,就从车窗跳了下去。车翻下几百米深的山沟,车毁人亡,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。

又有一次,日本飞机来丢炸弹,人家都躲了起来,只有他还在外面好奇地仰着头看空战。一颗炸弹扔下来,弹片飞到他的右胸部,用手一摸,全是鲜血,幸好伤得不深。可他却警察给抓走关了起来。飞机来了不赶紧躲开,还在外面观看?又不是不懂事的孩子,这举动也太奇怪了吧!警察怀疑他是汉奸,有意暴露目标。后来还是校长茅以升亲自把他保了出来。

为了挣脱老城的束缚,很多地方开始大肆拆除城墙。首都北京在拆,到处都是毁墙的炮声。“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,竭力反对拆除城墙,四处奔走呼吁,痛心到流泪。”然而,他们的努力也没能拯救北京的城墙。

南京也在拆。“上世纪五十年代,除了建设委员会,还有鲜为人知的拆城委员会,任务就是拆除明城墙,以求便利交通。”麦老回忆,一批专家学者出面力保,特别是当时的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朱口,极力主张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物。

在南京市建设局担任主任工程师的麦保曾,被派去调查拆城情况。他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沿城墙根走了一圈。许多地段已经成了缺口,最可惜的是通济门,这座明代十三城门中最为壮观的一座,也倒在了1956年的拆